



工作人员在陕西寺塔工地清理发现的建筑构件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几十年来，从联合开展濒危遗产的保护，到积极参与冲突地区遗产事务的国际治理，中国文物工作者也经历了从单纯修文物、执行任务，到紧跟国际趋势，扩展视野，实现文明智慧交流互鉴的过程。

## 60多年来我国不断援助他国，保护其濒危遗产

# 用华夏文明的力量守护世界文明

◎本报记者 张盖伦

“1959年8月，蒙古文化部一处长忽然来京，催促余工和我即日赴蒙参与维修工作。当时我患癫痫未愈，不得不带上合维生素之类药物，匆匆随余工第二次来到了乌兰巴托……”

这是北京古建筑修复所技术专家李竹君对20世纪60年代援助蒙古国维修古建筑的回亿。

这一项目也开启了中国文物工作者走出国门，保护濒危文化遗产的历程。

几十年来，从联合开展濒危遗产的保护，到积极参与冲突地区遗产事务的国际治理，中国文物工作者也经历了从单纯修文物、执行任务，到紧跟国际趋势，扩展视野，实现文明智慧交流互鉴的过程。

保护濒危的文化遗产，为困难中的人民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是一份崇高的事业，中国始终在场。

### 以真诚务实，拯救他国濒危文物古迹

李竹君提到的援助项目，其实始于1957年。

根据中蒙文化合作协定，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文物局前身)委派北京古建筑修复所支持蒙古的古迹修缮。北京古建筑修复所工程师余鸣谦和技术专家李竹君赴蒙古，对乌兰巴托兴仁寺和博格达汗宫两处喇嘛庙古建筑进行了勘察测绘，完成了修复设计方案。

然而，由于此次修复项目技术难度较大且工艺要求高，还需在蒙古国40周年国庆之前修复完毕。即将开工之时，蒙方强烈请求中国专家再赴现场亲自指导。

李竹君回忆，当时蒙古国在古建筑保护工作上几乎是空白，工作条件很差。天气寒冷，建筑工人在工棚内砌火墙取暖；人员不足，从国内又抽调选拔了25名古建工人；当地修复材料短缺，中国提供青砖灰瓦、生桐油、颜料等许多材料。油漆彩画工程涉及每

一座建筑物，于是他们招用了30多名当地蒙古小工，其中少数是略懂绘画知识的老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中国的师傅一边手把手地培训指导，一边实地操作，直至达到预期目标。

两座残破的喇嘛庙，经过历时两年的维修，最终以整洁朴素的历史新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国深度参与全球濒危遗产的保护，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柬埔寨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

20世纪中后期柬埔寨国内战乱期间，吴哥古迹遭受了严重破坏。199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拯救吴哥古迹国际保护行动”东京会议上，中国表示，将派遣最优秀的文物专家，无私提供所掌握的修复技术。中国成为吴哥古迹保护行动最早的一批发起国和参与国之一。

吴哥古迹的国际保护行动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1992年至2002年是抢救阶段，解决文物安全等基础问题。2002年开始项目进入第二个阶段，帮助当地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成为文物保护之上的主要目标。2013年底，第三届保护吴哥古迹政府间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三个阶段的来临，这个阶段更加突出社区、宗教、生态、旅游等概念。

中国参与吴哥古迹保护行动的三个阶段也呼应着上述三个阶段的特色。

在第一阶段，中国项目组的工作总体上围绕文物本体展开。在第二阶段，中国与柬埔寨技术人员组成的联合工作队在修复文物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当地人和当地人们的生活，文物的修缮改善了周边景观，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自2019年启动王宫遗址项目后，中国在吴哥的工作进入第三个阶段。除了对文物本体进行风险评估和保护修缮外，中柬联合工作队还对王宫遗址的历史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全面展示利用和社区协调发展等专题开展研究与设计工作，将中柬文化的宣传交流、专业技术人员教育培训以及数字化平台建设等工作贯穿整个保护修复过程。

中国参与吴哥古迹的保护至今已近30年，始终没有忘记当年许下的承诺——

以真诚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赢得当地人的信赖。

### 以大国担当，保护冲突地区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会受到岁月侵蚀，会因天灾受损，也会因冲突和动荡，而陷于险境。此时，这些人类文明的瑰宝，需要一处避难所。

2016年12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保护濒危文化遗产国际大会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会议通过了旨在成立“濒危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基金”和“国际文物避难所网络”的《阿布扎比宣言》。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并作大会发言。2017年下半年，基金转为“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盟”，以国际组织形式开始运作。

2017年5月，国家文物局推动中国国家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和苏黎世国家博物馆共同成为全球三个“国际文物避难所”。2018年至2020年，我国为联盟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支持。2018年6月，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分别派代表加入联盟董事会和科学委员会，实质参与管理工作。

这是我国深度参与国际文化遗产治理的体现。

截至2021年12月，联盟已经在近30个国家开展了150个项目。比如，波黑国家博物馆在20世纪90年代战争中受到重创，联盟划拨了60万美元用于该博物馆考古部和自然遗产部的重建。埃塞俄比亚的拉里贝拉以其公元11至13世纪修建的嵌入火山岩的教堂而闻名，近年来，风化和腐蚀严重影响着文物本体的安全，埃塞俄比亚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也让这处遗址面临威胁。联盟划拨了15万美元，用于加固文物本体，并针对当地的工匠和遗产专业工作者开展培训。

中国国内的多家博物馆还曾携手接力，共同守护处于危机的阿富汗文物。20世纪80年代，阿富汗文物工作者在战火中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巴克特里亚王国和贵霜帝国等时期的一批珍贵文物。本世纪初，阿政府用这批文物组织了“阿富汗

珍宝展”在全球巡展，展示阿富汗文明，也保护文物免遭战火。

2017年3月，该展首次亮相中国，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后，反响热烈。由于后续巡展面临取消展览计划，这批文物面临回国后不可预见的风险。这时，国家文物局积极统筹国内资源，责成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阿方协调合作，全力支持阿文物继续在华巡展。

在我驻阿富汗使馆的支持配合下，经多方共同努力，自故宫博物院后，展览又在敦煌研究院、成都博物馆、郑州博物馆、深圳南山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香港历史博物馆等八地九家博物馆展出。

在此过程中，中方始终怀着对阿富汗文明的崇敬之心，以尊重、包容和谦虚的态度，与阿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巡展顺利进行。2020年2月，巡展在最后一站香港结束后，阿方提出将展品运回阿富汗。此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家航空公司停运，运力锐减，国际运费暴涨，文物返阿面临的困难。中方充分理解和尊重阿方决定，为确保文物安全返阿，多方寻求资源，并在多次论证后制定了详细文物回运方案和安全预案，克服重重困难，协助阿方将文物安全运抵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这3年巡展，展现了我国珍视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大国担当，体现出用文明的力量守护文明的大国风范。今年1月31日，“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盟”第二届捐助方会议在法国巴黎卢浮宫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出席会议并致辞。李群在本次会议上向国际社会提出三点建议——勇担共同的责任、汇聚共同的力量、重塑未来的希望，这也是中国60多年来援助他国保护其濒危遗产、守护受到冲突威胁的文物古迹时不断摸索和总结思考的智慧。

(注：此文中所用“濒危”概念，指广义上文化遗产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因素而处于不利环境中、亟待保护和修复的客观状况，不是按照“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对文化遗产的分类和定性。)

珍宝库”在全球巡展，展示阿富汗文明，也保护文物免遭战火。

2017年3月，该展首次亮相中国，在故宫博物院展出后，反响热烈。由于后续巡展面临取消展览计划，这批文物面临回国后不可预见的风险。这时，国家文物局积极统筹国内资源，责成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与阿方协调合作，全力支持阿文物继续在华巡展。

在我驻阿富汗使馆的支持配合下，经多方共同努力，自故宫博物院后，展览又在敦煌研究院、成都博物馆、郑州博物馆、深圳南山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香港历史博物馆等八地九家博物馆展出。

在此过程中，中方始终怀着对阿富汗文明的崇敬之心，以尊重、包容和谦虚的态度，与阿方密切沟通协作，推动巡展顺利进行。2020年2月，巡展在最后一站香港结束后，阿方提出将展品运回阿富汗。此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多家航空公司停运，运力锐减，国际运费暴涨，文物返阿面临的困难。中方充分理解和尊重阿方决定，为确保文物安全返阿，多方寻求资源，并在多次论证后制定了详细文物回运方案和安全预案，克服重重困难，协助阿方将文物安全运抵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这3年巡展，展现了我国珍视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大国担当，体现出用文明的力量守护文明的大国风范。

今年1月31日，“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联盟”第二届捐助方会议在法国巴黎卢浮宫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出席会议并致辞。李群在本次会议上向国际社会提出三点建议——勇担共同的责任、汇聚共同的力量、重塑未来的希望，这也是中国60多年来援助他国保护其濒危遗产、守护受到冲突威胁的文物古迹时不断摸索和总结思考的智慧。

(注：此文中所用“濒危”概念，指广义上文化遗产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因素而处于不利环境中、亟待保护和修复的客观状况，不是按照“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对文化遗产的分类和定性。)

照六十年(1721年)元宵节期间，圆明园畅春园燃放烟花的图案：“一枚烟花弹飞入空中，迸发成无数盏点亮的灯笼，色彩纷呈的烟花在半空中散开，形成一幅绝妙的画面”。

据朝鲜文学家朴趾源所撰《热河日记》中卷四之“山庄杂记”，则描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中旬，他在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看到的“梅花炮”烟花时的情景：“万炮齐发，天空中犹如出现朵朵盛开的梅花；形态各异的飞鸟出现在空中，或飞翔，或啄羽，或逐蝶，或衔果；随后空中又有各种神佛造型，或乘舟，或驾鹤，或负剑，或擎葫芦等，令人目不暇接”。

对中国烟花燃放效果的盛赞，亦多见于多位来华人员的回忆录。《中国新史》第六章用“发誓说那是天然的东西而非仿造”一语，来形容栩栩如生的仿葡萄藤火焰造型。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所撰《清廷十三年》第十一章描述了某年新年，他受康熙皇帝邀请，在畅春园观看烟花表演的场景，并用“所有被邀请的欧洲人，从来没有在他们自己国家看过如此好看的东西”来形容他的感受。乾隆年间的英国使臣马夏尔尼、巴罗所撰《马夏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五章回顾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中旬，他们在热河观看烟花表演的场景，并表达了赞美之情。

由上可知，我国古代优秀的烟花文化，为人所称颂。不仅如此，其中包含的物理、化学等知识，以及古代工匠精湛的制作技艺，都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 竺可桢与胡适的健康之“赌”

### 大师往事

◎刘为民

本月七日，是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与国学大师竺可桢(1890—1974年)逝世48周年。众所周知，竺可桢自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好习惯。其中，记录了大量有关气象研究的资料，弥足珍贵。经过战乱，现已保存下来1936年至1974年2月6日的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丝不苟，共计38年零37天，约800万字。竺可桢在日记中所表现出的顽强毅力和认真治学的精神，和他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有很大关系。

竺可桢与鲁迅同乡。浙江绍兴雨水多，竺可桢小时候站在屋檐下，边看边数那滴答作响的水滴，他观察到水滴落下的地方留下了一个个小“麻坑”。父亲告诉他：“这就叫‘水滴石穿’！你以后读书，办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只要持之以恒，就会有所成就。”

竺可桢铭记在心，直到去世前一天，他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日的气温、风力等数据。但是，大家很少关注他去世前3个月日记中写的一句话：“我从小身体就差，现已活到了83岁，何复所求？”

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话长，竺可桢5岁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考入著名的“澄衷学堂”。其为人热情正直，才学出众，自律刻苦，被推选为班长。但这样的刻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身体发育，造成他比较瘦小，身板单薄。他的同学胡嗣瑗——也就是后来五四文坛的大名人胡适，甚至怀疑他活不过20岁。于是，竺可桢暗下决心，制定了一套详细的身体锻炼计划，还写了6个大字：“言必行，行必果”，贴在自己住处最显眼的地方。从此，他每天早早起床，到校园里跑步、舞剑、做操，风雨不辍。经过努力，他的身体日趋强健，学习成绩也更好了，还获得了作为赴美留学生的资格。

有趣的是：他和胡适同年乘坐同一个航次的邮轮来到美国；1912年间，他又和胡适不期而遇，两人谈兴不减，据史料记载他们

还就健康问题打过赌。竺可桢问胡适：“我要是活过60岁怎么样？”年轻1岁的胡适爽快地回答：“你要是活到60岁，我在你花甲寿筵上当着所有亲友的面，给你磕三个响头。要是比我活得长，你可以在我的尸体屁股上踢上一脚。”“行。”竺可桢说，“你可得记住今天说的话啊！”

在实际生活与工作中，竺可桢一贯机敏过人、风趣幽默且思想深刻。比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深受师生爱戴。有一次，在全校联欢会的节目单上，特别“校长训话”一项。竺可桢到场后看到“训话”二字，觉得实在有违自己的性情与心愿。于是，他开讲就问：“同学们，训字怎么写？左边一个言字，右边一个川字，什么意思？”

他故意停顿下来，一时满座无声。看着同学们一张张洋溢着青春光彩的面孔，他笑着：“信口——开河也。”顿时，鼓掌雷动，哄堂大笑。

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于1962年6月以7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年代，还没有如今的高科技科研工具和电脑、互联网等技术设备，“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竺可桢主要用检索、阅读、摘抄的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他以70多岁高龄，往返奔波于各图书馆、情报所、博物馆及工作室，查阅了海量古典书籍。他探幽发微，索引钩沉，取精用宏并结合古今中外的多语种、多学科材料，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古气候史作了一次成功的探索，终于取得里程碑式的不朽成就，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震惊中外。这篇论文穿插引证了很多中国古典诗词曲赋及文献，来说明气候变迁的规律及特点。在气象学、候学领域成为划时代的里程碑，也为文史、科技跨学科的文化传播研究，树立了前进的方向标。

抚今追昔，思念竺老。他终生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处世原则，虽然少年体弱，但坚持体育锻炼弱为强，为晚年的科学业绩奠定了健康基础，也留给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 每将地耳作珍饈

### 物种笔记

◎梁永刚

地耳，豫中乡间称之为地曲连儿，是土生土长的野菌，藏匿草间，萌发雨后，褶叠如耳。地耳为念珠藻科植物，色泽或暗黑或深绿，摸上去滑溜溜的，犹如凝胶一般，跟海带、紫菜一样，同属蓝藻门植物，是真菌和藻类的结合体。地耳和木耳是一对姊妹花，形似，色也似，故谓之地耳，也叫地木耳。地耳喜水，伴雨而生，微小的菌种，经雨淋，身膨胀，很像泡发的木耳。滑嫩透明的地耳，最害怕晒，一旦雨停雾散，就要及时收拾。若等日头出来一晒，地耳便缩成一团，不肯露面。

地耳的别称很多，《本草纲目》上叫地踏菰，《养小录》中称地踏菜，其他还有地衣、地软、地钱、草耳、绿菜等。这些名字中，我最喜欢带耳的那类，尤以地耳一名，再贴切不过。雨后初霁，一窝窝一簇簇的地耳，在乱草中渐次苏醒，支棱着褐中泛绿的小耳，犹如娇儿躺在母亲温暖的怀抱中，静听大地的心跳，感受生命的律动。草是孕育地耳的产床，也是守护它生长的襁褓。凡是有草的地方，无论枯荣，不管长短，骤雨初歇，多多少少都能寻到地耳的踪迹，哪怕远离田野年代久远的草房顶，也是地耳的藏身之所。旧日乡间，草房多，瓦房少，下过雨，草房上黑压压一层地耳，和瓦房上的瓦松比着高。空旷的田野，手够不着，不好捡拾，上房又怕压塌屋顶，还不安全。吾乡之人，想了一个好方法：拿来扫帚，伸到房顶，从上往下扫，地耳便呼呼啦啦，雨点般落下来。孩童们乐得像过年，挤着在地上捡，一会儿就拾满一碗。

除了诸多文雅的别称，地耳还有不少有趣的编号。《野菜博录》将其唤作“鼻涕肉”，取其黏黏软软滑滑溜溜之特征。此种叫法，倒也生动形象，就是听起来不难听，吃起来倒胃口。地耳还有个更不雅的俗名，叫“雷公屎”，因其经常出现在雷雨之后，故而得名。“发菜”也是地耳的一个小名，因和“发

财”谐音，特别招人喜欢，吃是次要的，主要是讨个好彩头，图个吉利。“蓍仙米”这个编号也不错，灵动飘逸，富有诗意，让原本庸俗卑微的地耳，一下子沾了仙气，颇具神秘色彩。

最早把地耳写进书的，是南朝齐梁时期的名医陶弘景，他用“地木耳”这个名字，将其收入《名医别录》。最先药用，后来食用。地耳是药，可疗疾病。也是食，可果腹充饥。大俗大雅的地耳，不仅是古代本草典籍里的常客，还在民间食谱中占有一席之地，可谓是“席上奇肴，盘中珍品”。吾乡没有将地耳制成干品贮存的习惯，都是即采即食。

食用菌家族中，地耳不及木耳名头大，也没有银耳身价高，但肉质薄，更柔软，口感润而不滞，滑而不腻，其独特之处，是其他同类没法比的。地耳如翡翠之绿，但比翡翠更青；似木耳之脆，但比木耳更嫩；像粉皮之软，但比粉皮更脆，算得上味道最鲜美的乡间野菜。

地耳是上苍赐予庄稼人的一份厚礼，是饥馑年代穷苦人家代粮度荒的恩物。地耳又叫地踏菜，清代王磐编纂的《野菜谱》一书中，收录了一首名为《地踏菜》的民谣：“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照即原空。庄前阿婆呼阿翁，手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筐，还家饱食忘岁凶。”这首清新自然富有乡土气息的歌谣，生动地勾勒出一家老小采食地踏菜果腹度荒的凄惨场景。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地耳就是饥年代荒的重要野菜，不知拯救了多少穷苦大众。

地耳，一个朴素寻常且带着泥土气息的名字，宛如乡间素面朝天的粗布衣衫的清秀村姑，又似雨后田野竞相绽放的淡雅花朵，虽然没有浓妆艳抹的姣好面容，也无婀娜的动人身姿，却迎着缥缈的水汽恍然出现在很多人的梦境之中，散发着淡淡的乡愁味道。

## 烟花：一场持续了近千年的中国式浪漫

### 博览荟

◎周乾

今年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异彩纷呈的烟花表演，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式的浪漫”。烟花又名烟火、焰火、礼花等，由火药中掺入适当的药剂制成，燃烧时可产生声、光、色等效果。我国烟花制作历史悠久。南宋文人周密所撰《武林旧事》卷二所载“官漏既深，始宣放烟火百余架……效宣和盛际”，可反映我国至少在北宋宣和年间

(1119—1125年)就有烟花了。波斯(今伊朗)商人阿克巴尔于1516年(明正德十一年)所撰《中国纪行》第一章“去往中国之路”载有：“这个国家里老少都会做火药。烟火、爆竹是很普通的东西”。易知至少在明代，我国就已是烟花大国。不仅如此，我国古代烟花制作技术精湛，燃放效果唯美，令世界惊叹。

从烟花制作技艺角度而言，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撰《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三章对明朝的烟花技术做了评价：“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

巧妙地加以模仿”。

事实上，我国明清时期的烟花制作技艺极其高超。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墨娥小录》，其“配烟火戏剧”部分，记载了二十余种烟花的配比。利用硝石(硝酸钾)、硫磺、木炭等药剂的不同比例组合，使得混合物的燃烧速度、爆炸性能各有不同，可形成不同特色的烟花。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1719—1805年)撰写的《火攻略》一书，对烟花原料的提取、药剂的配合、燃放技巧等内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读。如书中“衣裳”部分，记载了掺入不同的材料，可呈现不同的火焰色彩：“棉花屑光则紫，铜青之光青，银珠之光红，铅粉之光白，雄精之光黄，松煤之光黑”。其中，“棉花屑”是指棉花衣疏液浆；“铜青”是指铜器表面的绿色物，主要成分是碱式碳酸铜；“银珠”为人工制成的赤色硫化汞；雄精即雄黄，主要成分是四硫化三砷；松煤的主要成分是碳。有了上述材料的掺入，才有了烟花的绚丽多彩。

烟花在燃放时，不仅可呈现多彩的火焰，还可在空中形成丰富的图案，这也是我国传统烟花文化的一大特色。当时来华传教士或使者所撰的回忆录中，对此多有记载。

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所撰《中国新史》第六章“中国人的礼节、典仪和节日”，记录了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元宵节晚上的烟花：“似舟，似塔，似鱼，似龙，似虎，似象，一般有上千种令人惊奇的烟火”。苏格兰旅行家约翰·贝尔所撰《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旅行记(1719—1722年)》第十一章记录了清康



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式上的烟花表演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